

刘怀君 王力军 著

秦汉 珍遗

眉县秦汉瓦当图录



眉县文化馆 宝鸡市考古工作队

刘怀君 王力军 著

秦汉 珍遗

眉县秦汉瓦当图录



三秦出版社

PDF
PDF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眉县秦汉瓦当图录 / 刘怀君、王力军著. -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02.5
ISBN 7-80628-581-4

I. 眉… II. ①刘…②王… III. 瓦当(考古) -
眉县-图录 IV. K876.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1449 号

秦汉珍遗

眉县秦汉瓦当图录

刘怀君 王力军 著

出版发行 三秦出版社
新华书店经销
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 131 号
电 话 (029)7205106
邮政编码 710003
印 刷 西安市永惠彩色印刷厂印刷
开 本 889mm×1194mm 1/16
印 张 10.25
插 页 3
版 次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3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1001-2000
标准书号 ISBN 7-80628-581-4/K·240
定 价 30.00 元



序

陕西关中地区是周、秦、汉、唐古都所在和畿内之地，遗址毗连，陵园密布，文物宝藏，驰名于世。特别是历代帝王为了追逐享乐，居高“重威”，乃大兴土木，广建宫室。《史记》记载，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可以想见当时殿阁林立，嵯峨耸峙的壮丽景面，真是“无令后世有以加也”。这一簇簇的宫苑建筑群体，由于风雨兵燹，岁月沧桑，早已沦为废墟而埋入地下，今已难数家珍。秦汉时期的成山宫就是其中之一。

成山宫，史籍失载。《水经注》、《三辅黄图》、《长安志》均不见传。但“成山”之名，却屡现于史籍。如《史记·武帝记》二十八年有“于是乃并勃海以东，过黄陲，穷成山，登之罘”的记载；《封禅书》云，秦始皇东游海上，行礼祀名山大川及八神，八神之中，“七曰日主，祀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齐东北隅以迎日出”；《汉书·武帝纪》也有“太始三年二月，幸琅邪，礼日成山”的记录。以上诸说可证“成山”有祠，以祭日出，而不言有宫。至于“成山”的位置，自班固以后历代注家均说“成山”在东莱不夜县，似是指今山东荣成县东伸入渤海的成山角而言。《三辅黄图》卷之五，列有成山观，亦云：“成山在东莱不夜县，于其上筑宫阙以为观”，注文又说：“成山观不在三辅。”这说明此地“成山”自与秦汉“成山宫”无涉。

2000年3月，宝鸡市考古工作队与眉县文化馆联合调查、试掘了眉县第五村乡成山宫遗址，获得一批珍贵资料，特别是“成山”云纹瓦当的发现，为该遗址的断代定性提供了更加准确的依据，这也是《秦汉珍遗——眉县秦汉瓦当图录》成书的一个重要时代背景。

有关成山宫的遗物，早年屡有发现，此处就不一一赘述，须特别一提的是发现于山西平朔的“成山宫行灯”，为汉宣帝时所铸，铭文直书“成山宫”，灯釜上面另刻一“扶”字，“扶”当系地名，即三辅之一的“右扶风”的省称，由此确知成山宫不仅在汉代存在，还归属右扶风。传世器还有“陈仓成山共(宫)金匱”、“陈仓成山共(宫)金鼎”、陈仓成山共(宫)鼎”等亦当为成山宫之物，不同的是三器铭文在“成山”之前都冠以“陈仓”二字，但未另刻“扶”字，陈仓，秦代置县，汉代因之，故城在今宝鸡市东戴家湾一带。成山宫在

汉代归陈仓所辖，仍属右扶风。今据以“成山宫”或“成山”命名的青铜器的存在，有力地证明“成山宫”在西汉时属右扶风陈仓县，陈仓县的辖区肯定包括眉地，这与当今我们所指的眉县成山宫遗址之性质和地理方位完全吻合。

研究秦汉时期的宫苑建筑，今天所能见到的实物资料，首推建筑物顶部所施的瓦当为重要，早年罗振玉《秦汉瓦当文字》卷一著录有“成山”云纹瓦当二品，其形制、纹饰、字体与眉县文化馆藏品一致，时代亦属汉代。先师陈直先生在《秦汉瓦当概述》中祠墓类“成山”条下曾“疑作成山帝陵解”，实则不然。今已确知“成山”云纹瓦当出自眉县第五村乡成山宫遗址，为成山宫建筑物所专用，“成山”即成山宫之省字。

基于此，刘怀君、王力军两位先生这部力作的资料品位、主题论证和学术价值，均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学术界自有评说，毋庸多费笔墨。我深感荣幸的是，两位先生将书稿送我拜读，实为快事，受益匪浅。这里，我想再谈几点认识。

一、该书集中刊录了秦汉成山宫遗址科学发掘所得的全部瓦当种类，冲破了传统著录瓦当的藩篱，独树一帜的新形式，这为专题从事研究成山宫历史的读者来说，无疑提供了最大方便。书后还附录了历年来眉县西岭村、赵家庄、尧上村等地秦汉遗址出土的部分瓦当。全书有主有次，这对于人们认识古代眉县的历史地位多有帮助。

二、该书是一部以图录和文字密切结合的研究成果，既有图录，又有研究，贯穿了以事实为依据，以理论为指导的科学研究方法。“绪言”中充分吸收了前人瓦当研究方面的成就，继往开来，深入系统地探索了瓦当的起源、形制、质地、用途、图案文字的发展变化，以及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都给予了正确回答。

三、该书在文字叙述和图案拓印上也有鲜明的特性。文字重点说明读者无法看到的瓦当背情况，独辟蹊径，使读者得以全面了解瓦当背图案，这为以后的瓦当图案收集、研究开创了新的思路。

四、该书作者以科学谨严的态度、清晰的研究思路，结合眉县的自然条件和历史，对全县历年来出土的各代重要文物作了扼要评介，藉此可以激发广大读者对眉县地方历史文化的更加热爱和向往。

五、该书根据调查发掘资料，对成山宫遗址的自然环境、文化范围、基址现状、出土遗物等内容——进行了讨论，这为以后的有关研究奠定了基础。特别是瓦当的分型定式，不仅树立了分期断代的标尺，而且对判定遗址的沿革、性质和年代也找到了依据。作者指出“成山宫的始建年代可能在战国晚期偏早，兴盛于秦代，而‘汉承秦制’，西汉时期加以修葺沿用”。这一论断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是正确的。

该书在细致的观察分析所录瓦当之基础上探讨了瓦当制作的工艺流程,这正是值得赞许的又一特点。劳动是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瓦当的发明和制作,是劳动者的智慧实践,研究瓦当历史不忘谱写创造古代文明的基本动力,这对进一步激励人们走向更深层的探索,是有现实意义的。

刘、王二君先后毕业于西北大学考古专业,多年来在宝鸡地区从事文物考古工作,积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为地方考古文博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他们在经济力量比较弱小困难的条件下,节衣缩食,致力于成山宫遗址出土瓦当的研究,取得了如此重大喜人的成果,殊堪嘉勉!

余有感于斯,故为文以为序。

刘士莪

2002年4月20日

绪 言

瓦当,是筒瓦顶端的下垂部分,一般也称之为筒瓦头、勾头,亦即北宋李诫撰《营造法式》“瓦作制度”中“华头筒瓦”的华头。它可以使屋顶的檐部椽头免遭风雨侵蚀,所连筒瓦部分与其它筒瓦一起覆盖了板瓦之间的缝隙,使屋顶的雨水不能渗漏,从而延长了建筑物的使用寿命,同时又富有装饰效果,使建筑物更加绚丽辉煌。既实用又美观。二者相辅相承,是我国古代建筑上集实用、装饰于一体的特有的建筑构件。

我国早在西周时期就已开始在建筑上使用瓦当,在扶风县的召陈村(陕西周原考古队:《扶风召陈西周建筑群基址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3期)、岐山县的礼村(陕西博物馆、文管会岐山工作队:《陕西岐山礼村附近周遗址的调查与试掘》,《文物资料丛刊》1978年第2期)等周原遗址中,都出土了西周的板瓦和瓦当。当时的瓦当尚处于使用的初际,纹饰较为简单,制作亦显拙朴。从已发现的实物看,纹饰以重环纹和素面为主,形制皆为半圆形,质地坚硬,呈青灰色,当面平整无凸起的边轮。有些出土时还在当面纹痕内残留有朱红颜色。素面瓦当一般形体较小,数量也相对较少。其制作方法大致是先制作成圆形瓦头,然后于当背泥条盘筑成圆筒形瓦体,再用细绳纵向通体勒割为两半,当面的纹饰是制成后手工刻绘而成的。春秋时期的建筑用陶,比西周时期有了较大的发展与变化,瓦当的形制缩小和变薄,筒瓦和瓦当之间还出现了瓦榫头,可以使铺设房顶的顶面显得吻合平整。战国至秦汉,由于生产力的大幅提高,统治者大兴土木,广筑宫室。当时的关中原,宫殿林立,楼台相连。“北至九峻甘泉,南到长武五柞,东至河,西至汧渭之交,东西八百里,离宫别馆相望属也。木衣绨绣,土被朱紫,宫人不徙,穷年忘归,犹不能遍也”(《史记·正义》引《庙记》)。“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史记·秦始皇本纪》)宫室殿阁的大规模发展也使瓦当的使用达到了顶峰。

秦汉时期(本书“秦”的时代涵盖春秋、战国时代的秦国和秦代;“汉”指西汉、东汉)的瓦当,从形制可分半圆和圆形两种。我们已知半圆形瓦当是自西周就已出现的,到战国秦时圆形瓦当开始出现,它与半圆形瓦当并行,到西汉中期以后,圆形瓦当成为主

流,而半圆形瓦当则渐渐退出,趋于消亡。

瓦当图案从大的方面可分作四类:图象、图案、文字和素面瓦当。秦时的图象瓦当主要是各种动物纹、房屋建筑纹、植物纹、太阳纹等,其语言是朴素、单纯、富有生趣的,同时又是夸张的,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秦人的社会结构和生活状况。秦人在立国之前,是一个以游牧狩猎为主要经济来源的部落社会,而艺术的产生与发展,不过是人类在生产实践中对现实生活的认知与提炼,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秦人在改造自然和生产劳动中,全面地认识了劳动对象的特征与概貌,运用写实的自然主义手法,采天地之灵物,寓生命之张力,赋动态之美感,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图象瓦当艺术,把思想传达给别人。那些灵巧多姿的奔鹿、凶悍的獾兽、精致的蝉纹、猎人斗兽的人兽夸张对比、精巧的虎雁、大气的蟾蜍,无一不显示了秦人卓越的艺术成就。到汉代,图象瓦当则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的四灵神物最具特色:青龙屈躯利爪,腾空飞舞;白虎姿态凶猛,动作灵活;朱雀凤头鹰喙,鸾颈鱼尾,姿势勇捷;玄武静中有动,浑朴而遒劲。它已从秦代的写实逐渐转向抽象与写意、由现实而神秘,由内容丰富的多极创造而归于有限的几种定式。由于四灵被赋予天之神物象征,可“以正四方”,作为一种遗制,一直影响到三国两晋时期(王家广:《由秦砖汉瓦论及秦汉陶瓷》,《文博》1984年2期)。

秦的图案瓦当种类繁多,内容复杂。有夔纹、旋涡纹、葵纹、云纹、变形云纹、勾纹等。图案瓦当是图象瓦当的发展和变体,图案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那些瓦当图案,大胆采用了超现实的理想主义手法,抛开对生活的直接模拟,曲折地表现了原型。如秦的葵纹瓦当,它的出现大约在战国之初,“应是植物尖叶和动物尾巴的曲卷。它继承和发展了战国以来艺术的写实手法和明快朴素的作风。排斥了奴隶主统治者在铜制礼器上所采用的死板僵化形式,以及追求浮华繁缛的艺术趣味,扫除了青铜器图案纹饰表现的恐怖气氛”(陕西省考古所秦汉研究室:《新编秦汉瓦当图录》,三秦出版社1986年版)。近年也有学者认为,这种图案可能是由水的运动生成,其含义或许与秦人尚“水德”密切相关(刘庆柱、李毓芳:《秦瓦当概论》,《周秦文化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葵纹瓦当的当心纹饰变化比较复杂,起初,当面多为“辐射纹”或“旋云纹”,它们象征着流动的水,当面中央往往形成一个旋涡点,呈现出乳钉纹饰特点。这类纹饰瓦当的进一步发展,使当面主体纹饰演变为当心圆中的纹饰,中心圆周边形成像“浪花”一样的花纹。当心“辐射纹”和当面“浪花纹”相简化,形成葵瓣纹。葵瓣纹由三线组成演化为双线或单线。葵纹瓦当中葵瓣纹的出现,当心圆内的要晚于当面的图案(陈根远、朱思红:《屋檐上的艺术——中国古代瓦当》,四川教育出版社1998年7月版)。秦的图案瓦当直接继承了我国古代先民在彩陶、青铜器等器物上图案的制作方式及构图原理,在浑圆的当面上,用高浮雕的技法,采用上下、左右对称的构图布局,使同一内容的图案得到重复的表现,既若

互为水中的倒影、又如同轴旋转的复制，这种平衡对称的构图布局，成为秦汉图案瓦当纹饰构成的基本原则。

这里须特别一提的是秦的巨型夔凤纹半圆形瓦当。这种瓦当流行于秦代，多用于皇室大型宫殿或礼制建筑。大者面径几近 80 厘米。秦君好大，素有营造大型宫殿的传统。远在穆公时代，戎使由余使秦，看到巍峨的秦宫，不由惊叹道：“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史记·秦本纪》）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宫殿的巍峨与奢华。灭六国后，秦始皇自以为功高五帝，地广三王，居功自傲，不可一世。每灭一国，则写放其宫室于咸阳。据《三辅黄图》所载：“始皇广其宫，规恢三百余里，离宫加馆，弥山跨谷，辇道相属，阁道通骊山八十余里，表南山之颠以为阙，络樊川以为池。”宫殿不仅在数量上增加很多，而且在单一的建筑规模上也更加恢弘。“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及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史记·秦始皇本纪》）。如此辉煌的宫殿，当然要配设相应的装饰构件，巨型瓦当的出现也就在必然之中。至于当面纹饰的寓意，还是应从商周以来的青铜器上的纹饰去追根溯源。夔，是传说中的独角怪兽，声如雷鸣，神秘莫测；凤，乃传说的飞禽之王，不仅可翔云以冲霄汉，还具圣德之美誉。二者结合而成的变体夔凤纹施于巨大的瓦当之上，由此寓意不言自明。

以云纹为内容的图案瓦当，兴起于战国中晚期，“是由铜器云雷纹及回纹演变而来”（陈直：《秦汉瓦当概述》，《文物》1983 年第 11 期）。也可能“是动物中的蝉纹、蝴蝶纹、饕餮、鸟纹等禽兽纹；植物中的树枝、花朵、光芒综合演变而来”（陕西省考古所秦汉研究室：《新编秦汉瓦当图录》，三秦出版社 1986 年版）。近年也有人认为：云纹源于葵纹。“同方向的葵纹瓦当，变成葵纹相间反方向排列，形成反云纹，纹由单线变为复线。反云纹是云纹的母体花纹”。“当心圆内的葵纹虽然仍为同方向旋转，但当心圆外的当面葵纹却出现了相邻葵纹的反方向图案，于是在同一界格内相反方向的二葵纹构成了原始的云纹图案”（刘庆柱、李毓芳：《秦瓦当概论》，《周秦文化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由于秦的统一，大一统天下的形成，使它迅速传布到各地，并日趋成为流行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瓦当图案，是“秦汉时代占主导地位的瓦当。只是魏晋以降，随着佛教文化的大规模传入与影响，云纹瓦当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让位于莲花瓦当”（刘庆柱、李毓芳：《秦瓦当概论》，《周秦文化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云纹瓦当从表面看来，它具有光亮、活泼的感觉，但实质上它孕含了封建统治者要求自己的宫殿以象天汉，祥云缭绕，求仙升天的思想，反映了封建统治者粉饰太平，“永寿嘉福”的享乐意识，以及“天人感应”的哲学思想。云纹的种类非常繁多，细分可达数百种，或并行使用，或互有传承，百花齐放，五彩缤纷。到了西汉中晚期，在关中的宫殿建筑上，云朵纹取代其它形式云纹，成为最流行

的云纹纹饰。云纹的发展过程,是图像向图案化发展的过程,“综观云纹定型以前的各种图像和图案的主流,就会发现瓦当纹样曾经经历过由素面到纹样,由简到繁,由写实到写意,由图像到图案,即由具体到抽象的艺术成熟过程”(陕西省考古所秦汉研究室:《新编秦汉瓦当图录》,三秦出版社1986年版)。艺术大师们采用灵活多变的手法,不断变换云纹的位置与形状,使画面纹饰的疏与密、大与小、点与线的布局,流畅自然,和谐统一,简繁得当,明快洗练。至善至美的作品,产生了沁人心脾的艺术效果。但同时,单一图案的重复,也禁锢了艺术大师们的创作灵感,图案瓦当就此由辉煌而渐趋没落,至两晋,开始被单一的莲花纹所取代。

随着云纹瓦当的定型,文字瓦当在西汉景帝时期开始出现,武帝时期开始流行,至西汉中晚期达到鼎盛。它具体把当时人们的种种愿望,通过建筑艺术形象化。其文字内容除100余种吉祥语外,还有很大一批与具体的建筑物有直接关系,如宫殿有“薪年官当”、“成山”官当、“长乐未央”、“羽阳临渭”等;官署有“官”字瓦当、“卫”字瓦当、“都司空瓦”、“上林农官”等;住宅有“焦”姓、“李”姓以及“马氏万年”、“严氏富贵”等。祠墓有“长陵东当”、“孝太后寝”、“西庙”等内容的文字瓦当。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纪事类,如“汉并天下”、“乐哉破胡”、“天降单于”等瓦当。文字内容繁复,涉及面广泛,从一个侧面记载了历史,反映出汉代封建统治者至高无上的意识,同时也反映出人们普遍存在的祈求康乐、太平、富贵、长寿等观念。汉代文字瓦当的字体,以小篆为主,兼及隶字,但也有少数鸟虫书体。阳文多而阴文少。文字少则一字,如“卫”、“官”;多者可达十二字,“唯天降灵,延元万年,天下康宁”、“与民世世,天地相方,永安中正”等。其结构形式,一般一字者居中,二字者上下或左右分置,四字者或纵横、或旋转均分当面,四字瓦当占文字当之绝对多数。“西汉时期瓦当上的文字,体势舒展,笔体刚柔兼备,方中带圆,以直配曲,一气呵成,气魄雄伟”(徐锡台、楼宇栋、魏效祖:《周秦汉瓦当》,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为不可多得的古代艺术珍品。

素面瓦当以半圆形居多,源自西周,就发现的情况看春秋中晚期和战国早期的秦遗址中,素面瓦当的数量明显多于战国中晚期和秦代建筑遗址中所出土者,战国秦的素面圆形瓦当数量极少,沿用时间直至西汉,这在咸阳诸汉陵中都有发现,不过由于其无纹饰、文字特点,历来不为研究者所重视。

二

秦汉瓦当受到人们注意,最早见于唐代吴融所作的《古瓦砚赋》,文中写道:“勿谓乎柔而无刚,土挺而为瓦;勿谓乎废而不用,瓦斫而为砚。”不过这还不能说是对瓦当进

行研究的发轫,因其仅是以古瓦当可为制砚的材料而加以描述。北宋的王辟之在《澠水燕谈录》中有关瓦当的记载,应是关于瓦当文字最早的、最明确的著录。文中提到一种“羽阳千岁”瓦当,“秦武公作羽阳宫,在凤翔宝鸡县界……居民权氏浚池得古铜(筒)瓦五,皆破,独一瓦完。面径四寸四分,瓦面隐起四字,曰:‘羽阳千岁’”。稍后的黄伯思在《东观余论古瓦辨》中写道:“今有长安民,献秦武公羽阳宫瓦十余枚,若今人筒瓦然,首有‘羽阳千岁’‘万岁’字,其瓦犹今日旧瓦,殊不朽腐。”他还记录了耀州(今陕西耀县)出土的西汉武帝时期的“益延寿”瓦当,并据以订正唐代颜师古对《汉书》相关条的注释之误,开瓦当文字研究之先河。南宋无名氏所作的《续考古图》,其卷一亦摹录了4种汉瓦当图形,最普遍的“长乐未央”瓦当则在此书始见记载。元代李好文《长安志图》卷中《志图杂说》记录了元代发现瓦当的情况:“汉瓦形制古妙,工极精致,虽尘壤渍蚀,残缺漫漶,破之如新。人有得其瓦头者,皆作古篆盘曲隐起,以为华藻。其文有曰‘长乐未央’,有曰‘长生无极’,有曰‘汉并天下’,有曰‘储胥未央’,有曰‘万寿无疆’,有曰‘永奉无疆’,亦有作‘上林’字者。昔人有于陈仓得秦瓦文曰‘羽阳千岁’。羽阳,秦武王宫也。以是知古人制作不苟,虽一瓦甃,必有铭识,不特彝鼎为然耳。有又得瓦作‘楚’字者,亦秦瓦也。秦作六国宫室于咸阳北坂上,意者必用其国号以别之欤?又‘未央’字瓦,凡离宫故基亦皆有之,今杜陵碎瓦中皆有‘未央长乐’等字,亦不知其何故也。”将瓦当文字内容与研究历史结合得十分紧密。不仅如此,他还开始注意到瓦当所连接筒瓦上的纹饰以及其所具有的意义。清康熙年间,福建侯官人林侗在甘泉宫遗址得“长乐未央”瓦,引起轰动,清代访求瓦当之潮由是大兴。乾隆时,朱枫(字排山,浙江嘉兴人)因其子任乾州牧,就养长安,获瓦当30,异品多至十六七种,编成《秦汉瓦图记》1卷,皆摹刻原形,是为瓦当有专著之始。嗣后收录瓦当及瓦当文字者渐趋增多,程敦、俞肇修、申兆定、毕沅、王昶、钱泳、孙星衍等人,迭有所获,秦汉瓦文始大显于民。至近代,罗振玉编成《秦汉瓦当文字》一书,收录瓦当300余品。录图之丰,鲜有出其右者。

1963年陈直先生发表了它的力作《秦汉瓦当概述》(《文物》1963年11期)。文章分文字瓦当为宫殿、官署、祠墓、吉语、杂类等五大类。此文的发表,标志着自唐代以来的瓦当研究开始从传统金石学走向现代考古学。1964年,陕西省博物馆编辑馆藏瓦当以成《秦汉瓦当》一书,收入秦瓦40件、汉瓦95件,共86种,有许多过去不见谱录的新品类。20世纪60年代初,中科院考古研究所与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一道试掘凤翔南古城遗址,出土战国时期的叶纹、葵纹、辐射纹瓦当和汉代的云纹瓦当。这是现代考古学对瓦当的首次发现与研究。此后,随着考古工作的进一步探入,发现日渐增多,大批有准确地层的瓦当出土,为瓦当的分期断代提供了科学依据,使传世的“瓦学”研究与现代考古学紧密相连,更趋科学。解放后的几十年间,我国的考古工作者做了大量的工作,

有众多的专著、论文发表。从瓦当本身的质地、纹饰、制法,进而分期、断代;由瓦当而建筑,由建筑而古史;从简单的纹饰描述,到开始探究当时人们的审美意识和生活哲学等等。国外学者也有一些关于瓦当的著录和研究,如日本的关野雄的《半瓦当之研究》,掘口苏山的《秦汉瓦砖集录》、伊藤滋的《秦汉瓦当文》等。研究水平的渐次提高与力度的逐渐加强,使我们有理由相信,“瓦学”研究必将成为古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秦汉瓦当的发现与研究,以宝鸡地区为最早,这与其在秦汉时期所处的地位是相一致的。当时中国社会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就发生在这一地区,有些不仅影响了当时的社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影响力甚至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的各个时期。自春秋早期,秦襄公被封为诸侯后,为了得到周天子许诺的岐以西之地,秦人便告别了久居的西垂,越过陇山,进入宝鸡地区。宝鸡地处关、陇通道,秦、蜀咽喉,那些如星斗珠玉般洒落在关中平原上的数百座离宫别馆,也就于此时开始了它的建造历程。秦人先立足于汧(今陇县东南的边家庄。张天恩:《边家庄春秋墓地与邑地望》,《文博》1990年第5期),后沿汧河东南进,于今宝鸡市戴家湾一带建汧渭之会(关于“汧渭之会”的看法很多,今采刘明科之说〔刘明科、高次若:《关于汧渭之会都邑及其相关问题》,《秦俑秦陵研究动态》第四期;祝忠熹:《秦人早期都邑考》,《陇右文物》1996年创刊号;陈平:《浅谈礼县秦公墓地遗存与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5期;徐卫民:《秦都城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版〕)。后又沿渭河东进,立都平阳(今宝鸡县阳平镇附近),经过近百年与戎狄的不断战争,夺得了关中西部的土地,并找到了理想的建都之地——雍城(今凤翔县境内)。秦人定都雍城,以此为据,才真正迈开了其争霸中原、称雄海内的历史脚步。楚汉战争中,汉中王刘邦“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在宝鸡地区击败章邯大军,平定了三秦,随后建立了西汉王朝。东汉末和三国时期,陈仓、眉城不断变幻着曹魏与蜀汉的战旗,铁骑纷踏,英雄辈出。诸葛亮五出祁山北伐曹魏,均与宝鸡地区有直接关系。公元234年,诸葛亮第五次北伐,终因积劳成疾,病逝于宝鸡岐山五丈原,留下了“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沾襟”的千古遗憾。

三

眉县,隶属于陕西省宝鸡市,地处关中平原西部,位于北纬34度,东径108度之间。与扶风、岐山、太白、周至四县相邻,南北长39.75千米,东西宽37.5千米,面积852.4平方千米,辖12个乡镇。气候属暖温带,年平均气温12.7℃。西(安)宝(鸡)高速公路、陇海铁路穿越县境,交通十分便利。渭河自西而东蜿蜒,分县境为南北两部,北部是渭北旱原,地势较为平坦;南部有秦岭山脉东西横亘,闻名于世的“太白山国家森林

公园”即在于此。从秦岭脚下向北，为呈东西向的带状黄土台原区，原面平缓，土层深厚。原与原间沟壑相隔，河流密布，形成众多的二级台地。这里台原深厚，土壤肥沃，为理想的农耕、居住地域，境内许多古文化遗址分布在这个地区。清《眉县志》云：“渭水横于前，太白耸于后，横渠东跨，五丈西临，壤地虽小，而民众富庶。”这是对眉县自然环境具体、形象的概括。

境内山川纵横，台原深厚，气候温和，林草丰美，自然条件十分优越，经 1958、1981、1989 年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查明。早在七八千年以前，这里就有人类生息繁衍，已发现老官台文化遗址就有 5 处；到仰韶文化时期，古人类活动非常频繁，几乎在境内所有河流的台地上均有遗址分布，清湫、岭堡、白家村、韩家沟等处遗址因面积巨大，内涵丰富，被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龙山文化时期，与关中西部其它地区相同，虽然遗址数量相对较少，而东坡、北兴、白家、岭堡等遗址堆积却很丰富。夏商之际，此地为周先民所居，重点遗址有嘴头、白家、东坡以及祁家村先周墓葬等。

西周以降，文物遗迹发现渐多。《诗经》：“申伯信迈，王饒于郟”，是为“郟”在史料中的最早记述。1981 年 3 月，青化乡油房堡村出土两件青铜鼎，其一鼎内有铭文：“王乍（作）中（仲）姜宝鼎。”《诗·大雅·崧高》：“王遣申伯，路车乘马。我图尔居，莫如南土。锡尔介圭，以作尔宝。往迓王舅，南土是保。申伯信迈，王饒于郟。”郑笺云：“郟，地名，属右扶风，今为眉”，《崧高》是西周宣王时诗，申伯为宣王之舅，申国为姜姓，与姬姓的周王室世代联姻，故厉王之妻称申姜。这些为姜姓女子所作的铜器，为我们探索西周时期这一地区的族属与古国提供了珍贵的资料。1956 年在眉县眉站乡东李村出土驹尊、方彝、方尊等西周青铜器 5 件，这些铜器造型奇特，精美无比，令人叹为观止。特别是驹尊以其独有的精美造型被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据考证认为这批青铜器可能为厉宣时器，器的主人“盩”是周的宗室。其中尊和彝的铭文叙述周王命盩统帅护卫王室的“六师”，监管镇抚殷人的“八师”军政，同出的驹尊铭文所记“执驹”典礼与《周礼》相合，反映了器主人盩的官职以及西周初期的军事制度和畜牧业诸方面的情况。东礼村在今眉县县城的西北，相传我国有名的青铜器“虢季子白盘”即出于此地。还有人认为，大小孟鼎亦出土于此（段绍嘉、何汉南：《眉县出土青铜器之初步研究》，《人文杂志》1957 年第 3 期）。1972 年发现于马家镇杨家村的旃鼎，属西周之重器，27 字的铭文记载了王姜将三块田地授予一名叫“旃”的人，反映了西周社会“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土地制度；1985 年在同一台原上又出土编钟 18 件，其中 3 件一组的编钟，为我国首次发现的西周编钟。铜器上的铭文对西周的官职制度、渔业、林业等方面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1991 年在同一地区相距不远处，再次发现西周墓葬 5 座，出土了一批青铜器。大量青铜器的出土，使我们对这一地区在西周时期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刻认识。

1993年在距眉县县城东南约20公里的营头乡铜峪村东侧修建水泥厂车间时发现春秋中期偏晚的秦人墓葬,该地为春秋时期秦民族的墓地之一。墓向正北,为夫妻合葬,脚下椁板上靠近二层台处有一具殉人骨架,墓主人均为左侧屈肢葬,殉人为右侧屈肢葬。出土器物主要是铜器和玉石器两大类,未见兵器和车马器等,这在同时期的墓葬中极为少见(刘怀君:《眉县水泥厂春秋秦墓及其相关问题》,《宝鸡文博》1993年2、3期)。

秦孝公时商鞅变法,实施郡县制,作41县。其时是否置有眉县,无明文依据,《史记·樊哙传》“攻赵贲下郿”。樊哙攻下郿地时,刘邦尚未平定天下,故郿之为县当在秦时应无太大问题。汉因秦制,制县曰郿。《史记·樊哙传》:“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郿令格杀信”,又《三辅黄图》:“右辅督尉治郿。”《说文》:“郿,右扶风县。”即为明证。

东汉初平三年(192),董卓被封郿侯,作为退身之地,在其封地筑坞,即为郿坞。斗转星移,世事沧桑,郿坞城废弃年代久远,原有城垣及建筑无存,因此,郿坞城究竟筑于何处,成为悬案。明代以来,地方史志对此多有论述,今人亦有考释(韦明焕,《郿坞旧址考》,《陕西地方志》1991年6期;吴镇烽,《陕西地理沿革》),但都因缺乏确凿的实物资料而令人难以信服。《水经注》云:“渭水又东经郿县故城南”,汉郿县故城在渭水北岸当无疑问。因之郿坞在渭水北岸当可确定。1983年,在常兴镇尧上村南发现的汉代“万岁”瓦当,打开这千古之谜的门扉。尧上村秦汉遗址主要分布在该村以南,北依渭水北原,南托陇海铁路,东西300、南北500米,逾铁路即为白家村秦汉遗址(有人认为可能是汉郿县县城置所地(刘怀君:《汉代郿坞、郿城考辨》待刊)。尧上村遗址的文化层厚0.5~2米以上,内含物主要是一些建筑用的砖、瓦残片,以及少量的陶器残片。20世纪80年代末,在此还发现了春秋时期的秦人墓葬,出土了一批匜、鼎、盘等青铜明器;20世纪90年代初,西(安)宝(鸡)高速公路修建时还在此出土了玉璜、玉璋、玉玦等珍贵文物。《后汉书·董卓列传》云:董卓“又筑坞于郿,高厚七丈,号曰‘万岁坞’。积谷为三十年储。自云:‘事成,雄踞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尝至郿行坞,公卿已下祖道于横门外。”号称“万岁坞”的建筑,承载着董卓无限的寄托,建筑所用的材料,亦定有所反映。依尧上村遗址的地理位置、遗址的文化内含以及“万岁”瓦当的发现,我们可初步确定董卓的“万岁坞”就在现在的尧上村遗址一带。

1986年4月,宝鸡市考古工作队在常兴镇东0.5公里处的常兴变电站基建中清理了45座汉墓,其时代由西汉初年至西汉末年的新莽时期,贯穿整个西汉王朝。其形制虽多为中小型墓葬,但出土物却极为丰富,尤其是陶器种类繁多,序列明确,为关中地区的中小型西汉墓的编年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也从一个侧面为我们探寻汉代眉城置所提供了线索与佐证(宝鸡市考古工作队:《眉县常兴汉墓清理报告》,《文博》1989年1期)。

1989年,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时,于城关镇西南1.5公里的西岭村,发现一处秦汉遗址,遗址西邻斜水支流清水河,其余三面地势略高,为连绵的农耕地。在东西300米、南北500米的范围内,发现了大量的板瓦、筒瓦以及云纹瓦当。此后,眉县文化馆又在该遗址发现了数枚文字瓦当。文字瓦当以“隳”字当为主,有两种款识,其一,当心以单线圈一直径6厘米的圆,内阳文篆书一“隳”字,圆外双线四区分格,区间填以双线羊角云纹;其二,当面中间饰一圆点,线段分割当面成两部分,左右分书“眉”“邑”两字。

20世纪90年代初,槐芽镇赵家庄遗址开始出土大量的秦汉建筑用板瓦、筒瓦、陶水管道以及各类建筑用砖和瓦当。赵家庄遗址,位于眉县县城以东,槐芽镇西1.5公里,北距赵家庄村800米,东距西沙河西岸50米。此处地势略呈南高北低,平坦开阔,耕土层下即为秦汉文化层,遗址中心范围东西400米,南北500米。当地村民俗称此地为“山城”,因何得名,已无从查考。于遗址内发现由六根五角形陶制管道连接铺设的下水道一条,陶水管两端一大一小,依次套接,呈南北走向。其表面饰弧线粗绳纹,内壁饰麻布纹,长70厘米、厚4厘米。水井一口,井口直径1.35米,带有陶制井圈,井圈呈圆形,青灰色,质地坚实,外饰斜绳纹,内饰麻点纹,壁厚2厘米左右。陶水管、井圈与秦始皇陵所出土的同类基本相同。调查时还了解到,原地面曾保留有一条高3—4米,宽约4米的夯筑土棱,可能是墙体的孑遗,惜已在“文革”中平毁。采集到的“隳”瓦当,当面大书一“隳”字,充盈整个画面,字体方正,用笔遒劲。字外圈一单线圆。

西岭、赵家庄两处建筑遗址,均始建于秦代,三种“隳”字瓦当,从字体结构看可视为一个字。《说文解字》云:邑和右卩通用。用邑者,因其历史上为封邑之地;否则用右卩。这与眉地在西周时为申伯封邑的记载是相符的。遗址建筑性质,到底是西汉时期的行宫离馆?还是郿县县治所在,尚难定论。但就目前已知的资料来看,西汉时虽设县众多,但专为县治使用瓦当的情况,还无发现。从文献资料来看,汉时郿县辖地在渭水之北,现眉县渭水南岸为当时的武功县辖境,这也从一个侧面排除了两遗址为汉郿县治所的可能。加之两处遗址内含一致,两地相距只有13公里,都出土“隳”字瓦当,遗址规模均不很大,作为县治恐难承载,因此,二遗址应是秦汉时期遍布关中的三百余处行宫离馆之二。

1981年,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时,于县城西南7.5公里的第五村乡,发现较大规模的秦汉遗址。此后不断有秦汉时期的砖瓦建筑材料出土。1983年,眉县文化馆的刘怀君先生于该遗址发现了书有“成山”字样的瓦当,引起学术界瞩目,开始不断有人前往探寻。1990年,西北大学的赵丛苍先生与刘怀君先生一道对该遗址进行了田野调查,获得了不少资料(赵丛苍、刘怀君:《陕西眉县成山官遗址的调查》,《考古》1998年第6期)。

2000年3月9日——3月28日,宝鸡市考古工作队与眉县文化馆联合再次对该

遗址进行了调查与试掘,获得一批珍贵资料,对成山宫遗址的文化面貌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遗址西临斜水,与岐山五丈原夹河相峙;南端台原高起,宛若绝壁,横扼斜谷;北去越过西(安)宝(鸡)公路南线,是为渭河;东依台原,地势舒缓,阡陌相连,自然条件十分优越。遗址南高北低,西、南部由于人为取土与河水的冲刷,原面退缩很多。经调查,南起原边往北约1000余米,西自原边东约600余米的范围内,均有秦汉时期的遗迹遗物发现,中心区域面积达30万平方米以上。南部现为第五村第三、四、五、六村民小组民宅所压,西南角曾于清代末年挖沟起壕,筑有围寨,形成人为的孤立小原,近年由于水土流失,民宅搬迁,原面日趋缩小,几近消亡。我们将此处划分为第Ⅰ区;由第Ⅰ区往东,过村间便道至第五村乡乡间公路是为第Ⅱ区;第Ⅰ区往北过壕沟现为民宅和农田,近年由于广植果树,对遗址破坏很大。北边地面原有俗称“凉粮冢”的大小土丘20余处,现仍存3处,最大的一座高约15、底径约20余米,相传为三国时诸葛亮北伐曹魏所筑。“文革”中当地村民平整土地,曾开挖几座,发现均为汉代砖室墓葬。是为第Ⅲ区。

从遗址多处暴露的断层观察,文化堆积距地表很浅,很多地方现代生活层下就是秦汉时期的堆积,保存情况不佳。调查发现多处的夯土台基、灰坑、散水、水井、排水设施等。

一、夯土台基 规模较大的有:

一号夯土台基:位于第Ⅰ区东南角,压在现代路土之下,距地表0.2米。东南部被MDH2打破,南北残长6米,上部残宽1.3、下部残宽2.4米。从北部剖面观察,是先开沟槽于生土,再填土槽内分层夯打,夯层厚5—8厘米。残存13层。夯层明晰,夯打致密坚硬,夯土内含纯净。平头夯夯成,夯窝排列整齐,夯窝直径5厘米左右。可能属建筑围墙的基础。

二号夯土台基:位于一号夯土台基西北约60米。仅存原建筑台基的西南角裸露在壕沟的断崖上,原有形状已无法判明。厚近2米。夯土亦为分层夯打,夯层清晰,夯层厚度5—7厘米。夯土纯净、坚硬。

三号夯土台基:位于第Ⅱ区,西距一号夯土台基约100米。夯土台基直接裸露在现地表,南部因原边坍塌,已遭破坏。东西长约20米,南北残宽约18米。夯土厚约1米。从断面观察,夯土为分层夯就,每层厚8—10厘米。应是某一建筑基址的基础。

二、灰坑 共发现灰坑6个。包含物主要是瓦、瓦当和砖的残片。

一号灰坑 位于一号夯土台基与二号夯土台基之间,残半,圆形,口大底小,呈环底状。灰坑原压在民宅之下,上部早已破坏。残径约1.5米,残深0.5米。填土色黑松软,夹杂少量的炭屑、红烧土块。出土少量的绳纹板瓦、云纹瓦当的残片。

二号灰坑 位于第Ⅰ区的东南角。开口在第一层即现代生活层下。此处原是清末所修围寨东门所在地。灰坑上部已遭破坏，现口呈不规则圆形，残径1.2—2.2米，残深2.5米。坑壁不齐，坑底略呈锅底状。向东打破一号夯土台基。填土色黑松软，夹杂少量的炭屑、红烧土块。出土物以筒瓦、板瓦、瓦当等残片为主，也有少量的砖的残片。

三号灰坑 位于第Ⅲ区。于村民刘有财宅院正南场院内。西距现原边约150米。据调查现地表以上土质已于“文革”中搬移。灰坑上部已遭破坏。现呈东西长4.5米、南北宽3.5米的不规则椭圆形，其口大底小，底部不平整，最深处距现地表4.2米。填土灰褐较松软，出土物依次为板瓦、筒瓦、空心砖、铺地方砖、瓦当、条砖等残片。另外还夹杂有少量的红烧土块、炭屑等。

四号灰坑 位于第Ⅲ区。压在原民宅墙基之下。不规则环底小坑，深0.5米。填土黑灰，出土“成山”瓦当残片、板瓦、筒瓦以及少量的回纹空心砖的碎块。

五号灰坑 位于第Ⅲ区。南距第Ⅰ区与第Ⅱ区相隔的壕沟约10米左右。原压在民宅之下，因民宅迁移遂被发现，上部已遭破坏。坑呈南北长7.2米、东西宽5.1米的长方形。南浅北深，最深2.5米。坑口稍敞，底部略小。坑壁修治光洁，不见工具痕。南部正中有一斜坡往北直通坑底，斜坡上窄下宽，剖面略呈梯形。坑底不甚平整，不见踩踏土的痕迹。出土物以板瓦、筒瓦、瓦当、砖的残片为主，间以少量的炭屑、石块和朽腐的小动物骨骼。

六号灰坑 位于四号灰坑的西北3米处，上部已被破坏，呈圆角长方形，南北长1.5米，东西宽0.8米。现深3.5米，坑壁平直，坑土黑褐，内含大量的绳纹板瓦、筒瓦残片。

三、水井 在第Ⅱ区发现水井一眼，位于三号夯土台基西约30米处的崖边，圆口直壁，口径1.3米，残深12米，已坍塌。井底有破碎的陶制绳纹井圈。

四、排水设施 遗址区多处断崖上裸露出排水管头，显示其地下纵横交错的排水设施。一号夯土台基与二号夯土台基之间有两条，均以陶质水管套接铺就，呈东南——西北走向。经解剖观察，铺设管道时，先于地面起倒梯形沟，置陶质水管于沟底，大小口依次衔接，其上再复土并稍经夯打。因东南端已遭破坏，而西北端又压在现民宅之下，其最终走向、长度已搞不清楚。

在第Ⅲ区中部西端面向斜水的断崖上，有巨型陶质水管道口裸露，距现地表高约3米，管口直径在1米以上。目前尚不清楚其走向与规模。

在二号夯土台基东南6米断崖上，有一垂直向的渗井，残深约4米。自二号夯土台基而来的平行向排水管道与其相接。上部残存40厘米的绳纹陶制井圈，下部为水积土，内含纯净，土质稍硬。